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精誠半月刊

胡庶華題

第 十 一 期

社 論

最近國內外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

張貽惠

在本刊第十一期將要發行之際，有三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件：是英日東京談判，陷入停頓狀態，日本宣傳機關，作和天津同樣的封鎖租界舉動。第三件：是江精衛出賣祖國工作，更積極而無恥，在南京計召集偽代表會議，希圖組織偽中央政府失敗以後，更跑到廣東去活動。第三件：是德國對於但澤問題，又突然加緊進攻，因此歐戰風雲大有劍拔弩張一蹴即成之勢。這三個問題，本刊讀者，一定是很關心的，因此簡單的在下面分別加以考察。

日本除過去文化，完全承受自我國以外，新文化的輸入，以及在遠東的抬頭，受英美的提携很多。尤其在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人怕俄國報仇，運動和英國同盟，英日人慨然允諾。那時日本人大有認爲無上光榮，感激涕零的狀況。但是時過境遷，等到自己實力充足以後，反說英日同盟，是上了英國人的當，白白的替他做印度的看門犬，日本毫無利益可言。所以日本人在國際舞台，完全是利己主義，陰謀主義，對於比自己強的國家，不惜卑躬屈節，模倣巴結，一且羽毛豐滿，也就立即反噬，毫不反顧。對於我們中國是如此，對於英美兩國，也是如此。且他的野心，又是龐大到毫無止

止境的。在未吞併高麗以前，說高麗是學生命線，併了高麗，又說東三省是他的生命線，九一八以來，華北又變成他的生命線了。埃及，以及英倫三島，都有他的生命線。所以對國際上這隻瘋狗，不能不稍事縱容。英國對於日本這個國家，似乎早應當認識清楚，但是在天津租界問題發生以後，反來和日本開談判，變做初步意見，並有可渡程案嫌疑之擬議。這在不能不使人對於英國目前政治家，有目光太覺短淺之懷疑。自然歐洲問題，不無牽連，但使也不能不有所牽就，但是一日縱敵，萬萬萬患。現在我們中國，正在和日本作殊死戰，其

第十一期目錄

社論 最近國內外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

問題

抗戰前途與青年應有的責任

抗戰前途之史的觀察

錢玄白先生參加國語運動的二十年小史

川康考察旅途報告

廟台子留候祠(詩)

教育與文化消息

編輯後記

民國廿八年七月一日出版

張貽惠
胡庶華
楊人楨
鄭家鏡
涇渭
薛貽源
于

最好的政策，只要加緊援助我們，自然就能把日本打倒，並不需要英國人自己流血。自從南昌失陷以後，日本向鄂北山東山西方面，屢次進攻，不但毫無進展，並且受極大的損失。這一方面表示我軍愈戰愈強，一方面表示敵人已成強弩之末了。英國人不是對於這一點認識還不大清楚，把日本的力量估計太高，認為我們不容易完全把他驅出境外，就是意圖苟安，只顧目前暫時利益，而未顧及到將來的永久利害。整個的援華政策，在國聯會議屢次議決的立場上，以及英國自身的利益上，當然不致有所變更。況且我們始終決定自力更生，並不依賴任何外界的援助，對於英國人這種態度，本可以置之不理，不過我們和日本人，交涉最多，認識他最清楚，在國際正義的立場上，對於英國人在天津租界問題，表現出來的游移不決進退兩難的心理，似乎有振聳發聵之必要。所以我希望我們政府 and 國民，至少對於英國人，應告訴以下二點：

第一：日本是毫無信義，野心勃勃，絕對不能信任的國家。目前即使租界問題，能成立一種妥協，終久是要完全推翻，向大英帝國積極進攻的。

第二：我們不要國際的援助，憑我們自己力量，也要打倒日本。但是國際方面，如能有充分的經濟支持，和軍火接濟，在最短時間內，一定可以把日本驅出境外，所有國際的信用貸款以及其他種種援助絕對不會有絲毫損失的。

其次對汪精衛問題，作一個簡略的考察。在汪精衛年離中央，發表荒謬宣言的時候我們一方面替他過去的革命歷史惋惜，一方面希望他暫時匿迹消聲伏處海外，不要有

甚麼賣國舉動，不料他利令智昏，甘為敵用，僕僕風塵，希望把偽組織，統一於他個人勢力之下，為王克敏梁鴻志所反對，猶均述不悟，最可在南京，冀圖召集偽代表會議，組織偽中央政府，失敗以後，不得已奔赴廣東，進行華南偽組織，希望作王克敏梁鴻志第二，而不可得。其卑鄙無恥喪心病狂，可恨亦復可笑。汪之人格早經破壞，本不足惜，在此全國堅決擁護抗戰之際，無他進行的偽中央組織，偽華南組織能否實現，均於抗戰前途，不生任何影響。不過彼個人方面更進一步走入他自己墳墓而已。我們不替他可惜，只深替我們黃帝子孫，又產生一秦檜供後人之唾罵可惜罷了。

德國對於但澤進攻，自英法蘇進行談判以來，頗有緩和的景象。最近又突然緊張起來，大約是因為英蘇談判曠日持久，尚未完全成功的緣故。民主國宗的結合疏密，是極權國宗蠢動與否的一個象徵。英法兩國，如果不願把他的殖民地，重行分配割肉喂虎，要對於德義日三國，絕無沒有妥協的可能。在打倒德義日三國共同目標之下，所有民主國家，不但英法蘇聯，就是美國中國，都應當一致團結起來，等到把希特拉，莫索利尼，以及日本軍閥，一齊送進墳墓，全世界才有和平。那時不但是民主國家的幸福，也是德義日三國國民的幸福。希望英法蘇美三國，不要為目前瑣碎問題所束縛，毅然決然，棄小異而就大同，先把這些瘋人處置以後，再談其他一切的問題。

抗戰前途與青年應有的責任

胡庶華

神聖的民族抗戰，已經到第三年了，這是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敵人最初想不戰而勝，短期內可征服全中國，到現在敵人雖然想速戰速決，或速和速決，而實際是不可能了，他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不容易征服的，他們將來更會曉得中國是永遠不會被人征服的，因為中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四千萬方里的膏腴土地，四萬五千萬的優秀人民，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善良文化，有不可磨滅的立國精神，有光耀萬古的人類正氣，有異常偉大的世界觀念，生存在這個國土上的民族，充滿著和平思想，抱負著高尚的人生觀，向來主張懷柔遠人以至與滅絕，我們中華民族可以自炫自耀者在此，不願當自暴自棄者亦在此。

自從抗戰以來，世界上同情我國的日益加多，國際的形勢，一天比一天於我有利，所謂抵制日貨，援助中國，竟公然見諸議案，行諸團體，這就是我們長期血戰得來的獎品，因此想到「天助自助」以及「自力更生」的話，確是至當不移的名言。

在自力更生的工作中，有一部分雄厚的力量屬於全國青年，有無數的青年，投筆從戎；有無數的青年，農家耕難；有無數的青年，被敵屠殺；有無數的青年，爲國犧牲，有無數的青年，喚起民衆；有無數的青年，從事救濟。但是我們也看見有些青年，仍然過着舒適生活，抱享樂主義，同時也聽見有些青年，表示悲觀論調，和膚淺見

解，對於抗戰前途，抱着失望與懷疑的態度，此等自餒自悔的劣根性，非澈底剷除不可。

我們這次抗戰，除開武器和技術不及敵人外，其餘都不比敵人差，尤其是士兵犧牲的精神還比敵人強，這是值得可歌可泣的事，假如我們的武器和技術能與敵人一樣，至少我們可以減少些血肉的犧牲，這是一個血的教訓，我們痛定思痛，當平心靜氣承認過去的錯誤。

1 敵人明明是飛機大炮坦克車轟炸機這些東西來壓迫我們，而偏偏有人反對「唯武器論」。

2 敵人明明是用科學精深，技術優良，所以能把這些殺人器具，製造出來，使用出來，而我們不能「以牙還牙」，甚至從外國買來的武器，都還不會使用，偏偏有人一開口科學救國，即以爲「陳腐不堪」。

3 敵人明明是不願意我們有教育，尤其是不願意我們有救濟的發達，願意我們全國同胞，個個都「蠢如鹿豕」一無所知，願意我們全國青年，個個都放蕩無辜，游手好閒，而偏偏有人一開口救國不忘讀書，即以爲「倒車大開」，甚至罵爲「漢奸理論」。

4 敵人以其數十年的準備，向我侵略，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無不利用科學爲基礎，而最顯著者，是人人受過水準以上的教育，我們至今還有若干萬萬人不能識字，據最近的估計，全國學齡兒童，約爲四千一百四十萬人，失

學兒童，約有三千萬，全國中學生，約五十萬人，就可證明全國人口，每九百個人中，纔有一個中學生，全國大學生，不過四萬四千人，就可證明全國人口，每一萬個人中，纔有一個大學生，現在四分之一，又被敵人殘殺或驅散了，四分之一在租界或外人勢力之下受精神上的痛苦了，剩下來一兩萬大學生，若不能使其安心讀書，為高深學術留種子，為百年大計留元氣，這是何等可惜的事。

5 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應當是成年人所負的責任，而不能完全委之於學業未成的青年，至於宣傳工作，在假期可以盡量為之，而不能因此曠課，我們不能忽視青年的宣傳，但是亦應當注意民衆對於青年宣傳的注意，與夫民衆受宣傳的程度有好高，所以專要青年去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不是完全有利的事，尤其是在學校讀書而兼顧這些事，實有二者不可得兼之害。

6 教育是沒有時間性的。平時的的教育，應當就是戰時教育。教育的宗旨，在於培養優秀的人才，有充分民族意識，熱烈的愛國情緒，健全的體魄和精神，豐富的學識和技能，高尚的人格和品行，這些都應該在平時的長期訓練，決不是短期內所能收效的，如果說過去的教育失敗，實在對不起已經戰死的青年，和繼續奮鬥的青年，我們承認過去教育的缺點，第一是不能普及，第二是不求實際，因為不能普及，所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因為不求實際，所以不能適合今日科學戰機械的需要。

我把對於現在一般的青年救國理論有不能苟同的幾點說出之後，再進一步，把我的主張提出來。

一、今日青年，如果情殷報國，不能安心讀書或做事

，而欲實行袁簡齋詩中「男兒欲報君」此字樣在應當改作「國字」恩重、戰死沙場是善終，」的兩句話，我贊成他們立刻當兵，或投考軍官學校，航空學校，或其他與軍事有關之訓練班，但是有三個條件須注意。

1 身體方面是否有當兵的資格。

2 志氣方面是否有百折不撓的精神。

3 環境方面是否毫無牽掛與障礙。

二、今日青年，如果想當兵而又不當兵，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在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方面努力，我贊成他們犧牲畢業或事業，專心致志來做這件事情，不要拖泥帶水，雙管齊下，而且也有二個條件須注意。

1 經濟方面，是否可以自給自足，或有其他補助。

2 行為方面，是否可以引起大眾的信仰與同情。

3 精神方面，是否有刻苦耐勞的習慣。

三、今日青年，如果既不能當兵，又不能從事民衆運動等工作，而且有一個求學的機會，那麼我贊成他們一心一意讀書，但是有幾點須注意。

1 不是埋頭讀書，而把國事戰爭完全不聞不問。

2 對於抗戰的缺點，如何準備補救。

3 對於建國的需要，如何準備供給。

星期日，則從事募捐、演劇、宣傳歌詠，寒暑假則組織勞動服務團、農村服務團等。

青年是中國將來的主人翁，青年是國家的新生命，吾人欲興中國，必先教育青年，非年而欲報國，必先明瞭其

應有的責任，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1. 繼承光榮的歷史

中華民族在地球上為文明的種族，對於人類的貢獻，比埃及印度希臘羅馬各民族為多，若蠶桑，若宮室，若舟車，若弓矢，若造紙，若印刷，若火藥，若磁器，都是中國人最先發明的，現在世界青年，都向科學作勇敢的追求，而我們對於西洋的發明與創造反為望塵莫及，這是何等痛心的事，今日中國的青年，應當繼承光榮的歷史，迎頭趕上西洋的科學。

2. 轉移萎靡的風氣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身體上已經中了大毒，自歐美風氣輸入中國以後，中國民族精神上亦受影響不淺，浪漫的風氣，淫靡的習慣，隨着物質文明一紛至沓來，青年誤解自由，往往不願受嚴格的訓練，尤其是大學學生，以為是自由之神，殊不知歐戰以後，各國知青年的散漫放縱，極非今日生存競爭異常劇烈的世界所應有，無論和平陣線或侵略陣線的國家，都主張嚴格訓練青年，今日中國的青年，應當個個都受嚴格管理，并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準備隨時為沙場的戰士。前方流血，後方應當流汗。

3. 加強自信的心理

中國近百年來，受外患的壓迫，久已失去了自信自尊之心，就是新的教育，也多模倣他人，屢經更換，無力自拔，自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確定以後，業已萬法歸宗，一面把固有的文化從根救起，一面把西洋的科學迎頭趕上，

行之十年，成效大著，敵人知此種勢力之不可侮，於是加緊進逼，提前發難，試看敵人屠殺青年，焚毀黨義，足以證明此種論斷之真確。我們中國，曾受過幾次外患的蹂躪，但是我們之文化力比外族都高，結果俄們仍得復興，現在敵人的文化力比我們強，在抗戰期間加速地增強文化，就是增強我們的自信心，我們多一分的自信心，即多一分的抵抗力，也就是少一分復興的障礙，所以無論我們這一次抗戰的結果如何，而青年對於復興的信念與主義的信仰，是不能放鬆一點的，我們有了盡善盡美的三民主義，惟恐奉行不力，不應當在此時此地，另有主張。

4. 注重實際的工作

青年在太平時代，思想盡量自由，議論不妨多講，若當民族生死關頭，前方出生入死，後方入主出奴，議論紛紛，無補實際，而且有許多刊物，簡直有分散抗戰力量的嫌疑，無論其居心如何，都有些對不起前方將士，以為最實際的救國工作，是多做對於前方有益的事，如募集鉅款，慰勞將士，購置醫藥，贈送傷兵，偵察漢奸，救濟難民，其不能讀書或無心讀書的青年，則直接參加正規軍或組織遊擊隊，其尚能在校讀書的青年，應當注重國防技術的研究及製造以及特種訓練，如機械修理，汽車駕駛，浮橋搭造，電信裝置，以及化學兵器製造等等，都宜視為常識，以應戰時實際的需要。

5. 堅定必勝的信念

拿破崙說，戰爭的勝負，在最後五分鐘。德國戰術大家特爾哥說，能够支持長期戰爭的，就是取得最後成功的

重要保障。現在我們正蓄積這種長期抗戰的力量，成千成萬的政治工作，先鋒的急進養成；機械化部隊的加緊訓練，空中突擊英國一天比一天長成起來，無疑的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我們千萬不要因一城一地的得失，以為喜懼的標準。戰國時代，齊國在燕樂毅大舉進攻之下，連失七十餘城，僅剩下莒與即墨，田單據着即墨，不久乘着燕軍內部的崩潰，猛然取攻勢，大敗燕軍，完全收復失地。西歷前二百年間，迦太基的英雄漢尼拔遠征羅馬，席捲羅馬全土，而且蹂躪了十餘年，終以精銳的消耗殆盡，為羅馬軍在薩瑪得得一敗塗地。英法百年戰爭，英國佔領法地不少，結果以貞的奮起，完全驅逐英人出境，歐戰時法國領土被德軍佔去三分之一，比利時的領土，被德軍佔去十分之九，結果還是完全退出。土耳其與希臘作戰，退到安哥拉一隅，結果還是勝利，今日中國青年，能堅定必勝的信念，就是抗戰前途的曙光。

6. 充實建國的能力

建國大業，絕無萬端，青年有完成的責任，尤須有完成的能力，苦不及時充實，必致後悔無及。如何充實，則人格的修養，知識的追求，體魄的健全三者缺一不可。有才具與精力的青年，無不希望有充分發揮與充分運用的機會，不過才力發揮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正的道路，一條是負的道路。一國的青年，都向正的方向發展，自然一切都可以向完滿的大道上邁進，否則必得相反的結果。大凡古今人士，具有優長的才具，充分的精力，而無特殊的修養，往往救國成爲誤國，黃巢張獻忠李自成之流，以救

世救民始，以禍國殃民終。正由此際。抗戰建國領袖軍人，格有精力的青年，共同努力。祇問今日青年有沒有參加的能力，所以充實建國能力，實爲今日青年最大責任。在抗戰的時候，建國是充實，亦在抗戰的時候，一切都在青年自己身上。我不自亡，誰敢亡我？這一句話值得青年特別的注意。

蔣委員長說：「視青年如生命」我以為凡是在教育界服務的人，都應該如此。惟其我們愛護青年過切，所以希望青年亦過殷，我們希望青年有明確的認識，堅強的毅力，勇敢的膽量與大無畏的精神，參加這個大時代中抗戰建國的工作。或以最大的犧牲，創造壯烈的史蹟，或以最大的努力，創造最新的發明。費希特當拿破崙進攻柏林時，依然到處演說他的救國主張，勸國民不要自私自利，巴德當威廉第一的軍隊過巴黎時，正在巴黎大學研究微生物。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法國大敗，割了亞爾薩斯與羅林兩州土地，法國人認爲奇恥，以後所編的地理教科書把這兩州列爲專章，積多年的積果，每一個法國人發生到死，對於這兩個地方記得特別清楚，終于一九一九年無條件的收復，這些史實，足供今日青年的參考。

末了我希望青年重理智而輕感情，愛真理而戒浮誇，勿好虛榮，勿求僥倖，以革命的人生觀，奉行「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最高原則，從速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任務。

抗戰前途之史的觀察

楊人楩教授講 張拱貴 同記

所謂觀察，通常有兩個解釋：一是指主觀，一是指客觀。每逢戰爭爆發以前，時有主戰及主和的兩個相反主張，互相爭論。主戰者固然可列舉許多歷史事例，來證明戰爭的必要，和不戰的危險，反戰者也可用同樣方法來證明其主張，這都是屬於主觀的。根據現實的各種情況，以推測一個戰爭的前途，則是屬於客觀的。從歷史的觀點來說，兩者皆不正確。有人時常問：從歷史觀察，抗戰前途如何？對於這樣的問題，歷史學者常無辭以對。因為歷史學者的任務只在求真，把歷史上的現象用客觀態度表達出來，他不是預言家；他是不能預測前途的。

先就比擬來說，以歷史上某種或某幾種史例，來和目前的事實相比擬，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歷史上有一種事實的發生，是由許多因子湊合而成的，此等因子非如自然科學上的因子，可據以推斷其必然變化，而不受人事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歷史上決沒有兩件事，會有絕對相同的因子。就歷史背景而論，則有政治情況及國際關係之不同，就地理環境而論，則有地利及物質情況之不同，就人物方面而論，則根據情緒變化之伸縮性更大。要言之，一個事實皆有其特殊背景，歷史上無論如何找不出兩個相同的事實。所以用歷史上的事例來比擬現在的事實，實不可能。極端唯物史觀論者往往應用經濟自然發展的原則，認為只要具備了某種經濟條件，自然要產生某種結果；亦未免忽

視了人事關係。事實的發生，不僅時間有先後空間有大小，即人事亦有莫大之關係。例如：一般悲觀論者和一部份日本的學者，常說蒙古滿洲會先後兩度入主中國，且蒙古滿洲均為文化低落之民族，而今日日本的文化程度却不亞於中國，其能征服中國無疑。這樣的說法，實是忽略了歷史的背景。考入主中國之蒙古人及滿洲人，都是游牧民族，具有新興的武力，游牧民族每具有很精銳的初生力，多能征服其他民族，日本並非新興的游牧民族，此其一。宋末明末，漢族社會經濟皆有崩潰之象，因之社會秩序大亂，現在我國的經濟雖非絕對穩定，但已不是純農村經濟的社會，而受近代產業的影響，此其二。政治上，南宋時，政令不出閩門，權臣專政，武人每自成一勢力，中央直轄的軍隊極少，岳飛之精忠報國，固是人所共知，但我們要知道他是用十二道金牌方調回來的，由此可見一般了。明末的情形更不必講，後來竟欲靠投降的流寇餘黨以抵禦清兵。這一點與現在中央的權力，相差實在遠不可比擬，此其三。宋明時尤有一大障礙，便是士大夫階級的墮落，漢奸特多，而其作用之大，遠甚于今日之漢奸。蒙古滿洲之入主中國，全靠中國漢奸之助。現在的漢奸在數量上的確不少，但是武人降敵為害的，尚為數不多；文人雖多喪心病狂，但現在民氣及民智不同，決非少數漢奸所可左右；即令汪精衛憑藉其已往之歷史及政治地位亦不足以號

召，是復顯明，此其四。蒙古滿洲人既均為文化低落的遊牧民族，故對被征服民族不得不採懷柔政策入主中國後，即崇孔尊儒，以收人心。日本則不然，他並不需要吸收中國的文化；至多只藉之為一種號召的幌子罷了。舊式漢奸如洪承疇之流，頗能代表當時一部份人之意見，故為敵人所重視，因而也能替中國人說幾句話。而今日被日本所驅使的漢奸，除作傀儡以外，不能發生其他作用，此其五。蒙古滿洲之入主中國，只在要求皇位，統治中國而已，彼時漢族人雖有亡國之痛，但與今日亡國奴之處境，已有霄壤之別。我們深知今日日本之存心滅亡我中華民族。認識了敵人的毒計，更堅定我們抗戰的決心。日本空軍在我國各地濫行轟炸，雖然對於大民生命財產有所損害，但更是引起我全國民衆同仇敵愾的決心，此其六。蒙古滿洲入主中國時，國際關係與今不同；蒙古在亡宋之先，已滅遼金，當時實也無一與國；明的與國不過是有名而無實力的羅馬教廷而已。而現在的國際關係極為錯綜複雜，我們的友邦極衆，此其七。所以根據蒙古滿洲的例來推論日本亦能征服中國，實在是一個錯誤。

相反的：樂觀派所倡漢族文化同化說則更是白天在說夢話。他們以為蒙古滿洲入主中國，終為中國文化所同化，即令日本征服了中國，終久會被漢族同化的，這根本是錯誤到極點的見解。如一旦中國不幸被日本征服，則我們決無把握以同化她。蒙古滿洲人為文化低落之民族，而今日本則不然，我們不可太自信自誇以為我們的文化一定能超過人家，因而可以同化人家。同時現在亡國之方式與過去不同，政治手段比從前毒辣，如日本統治中國，勢必要

想出種種法子，來根本滅絕我們民族的固有的特性，所以我們不可把今日的日本，同過去蒙古滿洲相提並論。

再從西洋史例來看。樂觀派每喜舉英法百年戰爭來和現在我國之抗戰相比擬，他們以為當百年戰爭之初，法國屢次敗北，國土喪失幾達三分之二，後來忽然來了一位女傑名叫貞德 (Jean d'Arc) 領導法人擊敗英人。到了一四五三年英國在法國的屬地，十九失去，最後勝利屬於法國。準此中國之抗戰只要堅持下去，亦可得到最後勝利。誠然，百年戰爭係由封建戰爭進而為民族戰爭，但仍為英法兩國國王之戰，個人爭奪王位之戰，雖有民族情緒，但不是為民族生存的戰爭，此其一。法國當時組織不健全，封建勢力很大，內訌不能統一，還不曾成爲一個 nation，此其二。當時國際關係不過是錯綜的封建關係，與現在國際關係的性質決不相類，此其三。從歷史之觀點來說法國女傑的成功甚為神秘歷史上尚未得到一個合理解釋，此其四。不錯，蔣委員長也曾說過：我們可以與敵人作百年戰爭，但他的意思只是說因為日本之侵略，責中日民族間的仇恨，結得很深，並不是用歷史上百年戰爭的陳跡。來和現在的事性對照。事實上，中國決不能讓自己一敗再敗，敗到最後出來一個神秘人物，來擊退敵人。

樂觀派亦有舉法國革命戰爭 (一七九二—一七九五) 爲例的。法國最先對奧宣戰，接連有西、瑞、俄、普、英等國，聯合攻擊法國，法國以一國家幾乎對抗整個的歐洲。一七九三—一四之間危機最大，看看戰爭打到法國境內，聯軍大有兵臨巴黎之勢，而反動派之內亂，更爲威

脅，幸得公安委員會的應付適當，始將敵人擊退。我們此次抗戰與其類似之處頗多，同是被迫而戰，為革命而戰爭，最後是為死亡生存而戰，但相異之點，亦復不少。這次法國對外戰爭，在事實上是法國為主動的，事實上不甚需要，而我們是抗戰。中華民族向來是酷愛和平的，但被迫到了民族的獨立與生存的關頭，戰則存，不戰則亡，我們不得不起而與敵人週旋，此其一。法國革命戰爭係發生於革命高潮時期，法國人的民族性，每當大難臨頭時，有一種潛勢力，能夠發生一種偉大的力量，可以担當起大事；人民一致熱忱協助政府，這個條件恐怕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並且公安委員會的寡頭政治，也與今日中國政制不同，此其二。那時法國的敵人雖多，但是敵人的弱點也很多，如彼此利害關係不同，意見也不一致，都是專制的國家，諸國內皆有不滿足份子，如受革命宣傳，則易趨於不穩；現在我們的敵人之弱點則與此不同，此其三。當時戰爭不如今日的進步，武裝也遠不如今日之發達，所以戰爭的變化也不如今日之神速。近代的戰爭，則進展很快，此其四。

其次悲觀派常以意阿戰爭為例，來和現在抗戰相比擬，恐怕我們也將步阿比西尼亞的後塵，被日本征服。固然意阿戰爭與我們之抗戰，頗有類似之點：如意阿亦為世仇，阿國係被迫而抗戰，阿國因物質上的缺乏，也採取游擊戰術，阿國也是須靠外援，戰爭亦發生於阿境等。但總異之點亦多：在政治上，阿國非Nation，其國內仍為許多酋長領導下的部落，這些酋長不甚可靠，有許多反被敵人利用。阿國只是為國王而戰，不是為全民族而戰，此不

同者一。阿國位於熱帶沙漠，交通上有利於機械化的武器，而阿國的軍事設備，與我們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據說阿國只有一架飛機（？），由此可見其他了，此其不同者二。阿國全恃一國王，故阿王一旦離京，京內放火強掠之事隨之而起，可是我們自抗戰以來，無論在外交經濟各方面都照樣進行，不因首都之陷落，而有崩潰停頓之象，且日見進展，此不同者三。在文化程度上彼此相差得太遠，阿國民生困苦，昧然無知，為一落伍的民族，此不同者四。故用阿國與我們對照，實在是自己侮辱自己，以阿國為鑒而慎重劃策則可，以阿國為例，斷定中國必敗則不可。

由上面二個中國史例，三個西洋史例，不論其為悲觀的或樂觀的來和中國這次抗戰相比擬，可說均屬錯誤。其此說到推測論：推測的要素，不外「知己知彼」，「知友」。即知道敵國的情形如何？我們自己的情形怎樣？國際關係的變化，于我們有利或有害。根據這些推斷戰爭的前途會有怎樣演變。自然，此等據以推測的材料，或多或少與歷史是有關係的，于是樂觀的必勝論者，根據敵人經濟情況來推測，說敵人國內物質準備如何用數字說明他可以支持多久，敵人經濟即將崩潰；政治組織不健全，外交上如何不利。悲觀論者亦可舉出類似的材料來充足其理論。敵人對我們也可作同樣的推測。要之，這種所得出來的論，在事實上還未證明以前，還算不得定論。將來的結果，二者必有一誤。須知推測法唯一的根據，便是「計算」計算是不免有錯誤，因為有許多潛伏的事實實在，不是我們目前所可知道的；而疏忽的地方亦復不少。例如，在抗戰以前，許多人都以為我國最不成問題的是軍

隊，而現在怎樣呢？我們所深慮的軍火與糧食，現在反成了主要的問題，而最感迫切的反而是軍隊。又有人說，我們抗戰只要能支持一年，國際上一定發生變化；或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今日我們抗戰已快兩年，國際上究有何大變動，世界大戰究在何時爆發，誰也不敢斷定。（廣義的說，世界大戰已開始了，因為意阿戰爭并非單純的意阿兩國之戰爭，西班牙內戰更爲顯著。）這可用生物學上「漸變」與「突變」的說法來解釋。一種突變的事實，絕非單純的數字可以計算出來的。何況吾人所得的數字，并非絕對可靠。所以，日本人自吹認爲幾個月內可以征服中國的，而今才知道是一個夢想；反之，一般人所認爲是泥腿的日本，并不見得一見水便飄解。如日本所料，則中國不必抗戰；日本果如我們所說，則日本決不會如此輕舉妄動。至於國際間的變動，尤非根據普通材料所可推知。總之，歷史上有突然發生的事實（其實，并非突然，不過當時人未曾預見到罷了），任你如何深慮，也難于計算周詳，毫無遺漏。所以英法百年戰爭中，有貞德之突然出現；拿破侖則有莫斯科之敗，世界大戰時德國則受阻於比利時；像這種突變的事例，實在舉不勝舉。並且國際間交涉，多半保守秘密，縱有嚴密的間諜網，亦難完全把握。歷史學家負不起這種推測的責任。

研究歷史，如同研究自然科學一樣，應該是客觀的，史家的任務，只在歷史上尋出事實的真象，尋求歷史演變的痕跡，而予以解釋（就歷史哲學而論，各家意見尙難一致，所以有些歷史家避歷史哲學而不談，但就目前而論，

上述態度，似已爲一般史家所同意的。）所以歷史家非預言家，他的責任不在預言，雖然有時他也能推測到一兩件事。政治或軍事家等，則把歷史學家所研究的結果，應用到實際政治及軍政上，以確定方針。正如富蘭克林發見電，再由愛迪生等應用電學發明電燈電話一般。歷史學家，必須客觀，所以法國大史學家呂德說：「能够置身局外，不帶主觀偏見，而告訴人歷史真象的，是爲第一流史學家，最壞的便是找出理由以證明其主張。」於過去史事中說明社會將如何的演變，史的責任便算完了。或者有人說：然則威爾斯 Wells 怎樣又預言「未來世界」呢？其實威爾斯並非內行史學家，也不過是利用一部分歷史學家積年累月研究的結果稍加綜合，而成一部世界史綱，而也的預言，也是多不免耳，世界大戰一九三六年底沒有爆發。總之，歷史家的職責不在預言，決不能確定將來一定會怎樣。

我們雖不能根據歷史的推測與比擬來斷定抗戰的前途，但是並非說這次抗戰即與歷史完全無關，總之，由於歷史的指示，也可供我們知道對於此番抗戰應堅持何種態度我們這次抗戰係由歷史條件決定的，實現我們的「抗戰必勝」的信念。根據歷史的事實，日本侵略中國是必然的，這已無待說明。中國的決心抵抗，也是必然的。歷史上所表現之中國民族的優越性，中國民族對人類文化之貢獻，都注定了這個民族是應該繼續生存下去的。德國的愛國學者如菲希特 Fichte 輩，認爲德意志民族爲世界上最優秀之民族，我們也可說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之民族；嚴格說起來，天之生人，除受地理環境之限制外，

其智慧才力相差有限，我們應有資格生存下去。歷史上雖「無不亡之國」，但是戰可圖存，和則其亡，如希臘之抵抗波斯大軍，終能延續國家的生命；而文明和戰不定之策，更是好的教訓。我們抗戰以圖存，也是歷史條件所決定的；中華民族已經傳到我們這一輩，不能讓其在我們手中而亡，這是我輩所應擔負的歷史使命。中國民族是有資格繼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們這一輩必須保持數千來所傳下來的遺產，並且要使之發揚得光大。

近來看見馮友蘭先生一篇「論主客」的文章，可以借來做我個人講演的話。他舉了好些例說明主與客的關係，因而說到當我們站在客位時，同時已站在主位，或應該站主位。他又舉了兩例，如我們對於惡人讓步，心想：他

會有一天遇到對頭的，這純是客位，但是誰也不反抗時，則惡人始終會碰不到對頭，因此我們也應站在主位。又如唯物史觀論者謂：資本主義發展到極度，必然崩潰（按此論真否，又當別論），這是客位的立論，說此話而同時站在從事社會運動的，則是站在主觀的地位。故此，說「抗戰必勝」是客位，努力去實現這個信念的，則是主位。那麼，我們用不着史的比擬與推測來決定我們的信念（自然或悲觀的態度；歷史的使命告訴了我們：單是站在客位裏說「抗戰必勝」是不够的，同時要站在主位去實現這個信念。我們一天不拋棄這個歷史的使命，中華民族便能生存一天。

錢玄同先生參加「國語運動」的二十年小史

錢玄同

民二十三的「整理清野」的政策既定，錢先生和我就約定暫不鼓吹GR，共同努力於現階段的急切有效的工作，「事求可，功求成」，他擔任漢字的「簡化字」，我擔任「注音漢字」，他以為這兩件事，如車之有兩輪，推教進育，「喚起民衆」，必從這兩方面做起。

民二十二「國語」論戰初發生時，曾帶有一種「手頭字」運動。錢先生認為這是可以提倡的，但總歸不可用「手頭字」這個名稱，仍舊要叫「簡化字」。他曾於民十一在教育部國語會第四次常年大會提了一個「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是一篇又痛快又充實的文章，當時該

來通過，也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他是首席委員。（詳見史淵序頁二九，原案也曾登新青年七卷三期）但以後大家都去弄GR去了，沒有注意這件事。事隔十餘年，到比二十三，上海印刷界忽然鑄造了幾百個所謂「手頭字」印在論語和文學標準定期刊物裏，他正在病中，也發發動手蒐集，以圖進而作一為主，想編成一部「簡化字譜」。又在民廿三國語委員會第九次常務委員會提出一個「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化字案」（見史淵頁二八一），同時我也提出一個「漢字注音簡化字案」（見史淵頁二八一），也提出一個「漢字注音簡化字案」，右等應列在「簡化字」一類。

精 誠 半 月 刊

不須另辨，名曰「注音漢字」；錢先生以為這兩件事互相關聯，應該同時進行。當時議決通過，呈請教育部施行；民廿四，一月，教育部開會討論，約我和汪怡先生到南京出席，錢先生送到東車站，親手致一封長信給我們，信中備列採定簡體字的具體辦法（原信見語週第一七六期。大抵錢先生近年所作的文字，大部分都登在語週週刊，重要的載引入史綱，但史綱是民廿二出版的，所以民廿四以後的材料，只能取找國語週刊了）。部裏對於這兩件事都決定完全照辦，「簡體字」就委託錢先生起草；「注音漢字」則由我主選，一面委商承鑄。到六月，錢先生的「第一批簡體字表」起草告成，計二千三百餘字（蒐集經過，略具於他致王部長及致張司長兩函中，見語週第一九一期）；又由我和汪先生拿眷赴南京出席教育部的簡體字會議（我給添上「簡體字之原則及推行辦法二十四條」，又「關於簡體字的各方面意見的報告」一通，錢先生又有致黎汪書一通，均見語週第二〇四，二〇五兩期。這個會議，由社會司司長主席，又科長科員二人，普通司司長科長二人，國語委員會常委二人，中央研究院及國立編譯館各專專家一人出席），討論三日，通過一千二百三十餘字；最後由部長圈定三百二十四字，於民國廿四年八月廿一日先行公布，是為「第一批簡體字表」（錢先生的原草案有二千三百餘字，這個公布的只得其尾數）。並公布「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推行部頒簡體字辦法」九條，其第七條云：「自廿五年七月起，各學校考試答案，部頒簡體字，得一律適用」（部令全文及三二四個簡體字表，均見語週第二一一，二一二兩期）。這就是二十年來的國語運動中「簡體字」

運動的一般極而略的歷史，也就是錢先生回來感到興趣的而最近幾年還在病中力疾從事的一個工作。（至於我所負擔的「注音漢字」工作，錢先生雖也時常參加意見，但其具體情形及公布的六七八八個注音漢字表，已詳敘在「注音漢字」一書中，此不旁及。錢先生常和我討論日本「凡世付」的辦法和五號注音漢字，他的意見略具於我的「錢玄同書中，見「注音漢字」頁一二〇。）

中國新文字的建設工作剛剛起首，何以忽又折轉回車，專辦「簡體字」和「注音漢字」呢？固然「學堂書野」是一時的政策，但也還有個歷史的哲學基礎。錢先生遠於春秋公羊之學，有時也把「三世」來推斷當前的一切事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語），世界化的「國語羅馬字」，應該是「太平世」的初步；現在中國社會還離不了漢字的環境，總須就漢字加以形體的改良和聲音的幫助，所以選定「簡體字」和鑄造「注音漢字」，普遍通行，才可以了結這「昇平世」之局。我在「大眾語短論」中也曾宣布一個原則：「大眾語文所用之工具，第一，漢字改『良』，用『簡體字』，這是過去殘餘階段的補充工作；第二，漢字改『換』，用『音符符號』，這是現在過渡階段的緊急工作；第三，漢字改『革』，用『國語羅馬字』，這是將來必然階段的準備工作。」並說三種工作，同時要做，其間看似矛盾，並無衝突，所謂「相反而實相成」，可是必須鑄造了推動了「注音漢字」，才可以把這三階段的進展，在現階段實際工作上，所有一切的衝突，的矛盾，統一起來。（詳見史綱序頁二八至六一。）錢先生說：「你把我的簡體字工作又降下去一級，未免可惜吧！彼哉彼哉！」

，簡體字難還是『據亂世』的事情？我說：這三階段的工作，都在『昇平世』的末期，所以同時要做；『昇平世』又分三階段者，即公羊家所謂『三世之中復有三世』也。他道：『好！不過先生那種說法未免太時髦了，現在鄙人想不用那些字眼。』不料就在這民二十四，『簡體字』公佈後，中央要人，皆主席，名流，都有極力反對的，南方還發起有個『存文會』；民二十五，二月，國語委員會接到教育部一個訓令：『准行政院一月二十九日第六一四號訓令開：『案奉國民政府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一二七號訓令開：『為令飭學，案准中央政治委員會二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函開：『查推行簡體字辦法，前由教育廳呈行政院轉呈中央政治會議准予備案，茲本會第五次會議，認為尚須重加考慮，爰議決：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相應函請政府令行政院轉令教育部遵照』等由，准此。……』等因，奉此。……』等因，奉此。除分令外，行令仰遵照。此令。』錢先生看了之後，我對他說：『『昇平世』固然差得遠，就連『昇平世』也慢慢，簡體字果然要列入『據亂世』了！』他良久道：『倒也不在乎！』（至於『注音漢字』，自民二十五以後，雖然出版界的小學教科書和民衆讀物都是遵照教育部的法令辦的，但民二十六蘆溝橋事變起，北平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商家承鑄的注音漢字字銅模，大小各號還沒有鑄完，已鑄成的又都陷在戰區，不能運出，事實上就無形停頓。這種情形，錢先生養病北平怕還不甚知道；以為兩南一帶，我們還正在做有效的推行工作呢。）（9）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動議於民八，成立民十二；到民

十六，才用錢先生和我與吳敬恆先生三人的名義，向中華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請了一筆款，著手搜集材料，作為教育部國語會事業之一。我定了一個計劃書，分為五部十五組，並各訂章程，他說規模太大了，我說這是建設中國新文字的總『樞台』，規模不能不大（『樞台』的理論，詳見綱序頁一〇六，一一三。）民十七，南北統一，戰地政務委員會來北京，北京改名北平，大總統府（即居仁堂）所在之中海，關為文化學術機關區，錢先生主張要在那裏頭去找房子，我們說教育部既南遷，雖有北平市黨部搬遷去了，但大辭典編纂處儘容得下，他大不謂然，說：『既是咱們大規模的總『樞台』，豈有不和國立北平圖書館並立在中海之理？』那時候，圖書館正撥定居仁堂為館址，後來在北海岸邊蓋了新館，才搬去文津街的。我只得和他兩人奔走經營；終於由戰地政務委員電准國民政府劃定居仁堂西四所為處址。一切接收，交涉，分配等事，他都親幹，緊張之至。我平常只覺得錢先生的議論激昂慷慨，這一次才感到他有時辦事也能一鼓作氣，一往無前。到民二十二，『蒐集』和『整理』兩部工作都告一段落，已剪錄書報約四百四十冊，排定材料卡片約二百五十萬張，就開始做『纂著』工作，錢先生和我分任總纂纂，他主字形，我主字義與詞類。但總纂覺得規模太大，成勢不易，我也覺得時局可危，未便曠日持久，於是於民二十三的國語委員會第廿九次常會提案通過三案：一，增修國音常用字彙；二，規定說文廣韻類韻的今讀以作新編國音字典的初步；三，編纂國語標準詞彙。（『事詳史綱頁二〇〇，二七八，三

○三。又錢先生對於辭典中的「譯名」問題，也很有正確的意見，如民二十三年案中，有一規定國語文中採用西文原字的辦法案」，見史綱頁三六五，這是他最後的主張。他以前在新青年中也曾論及譯名問題，但三卷三期，六卷三期。這三部書他都親自動手，但這年他已得病中，所以第三案併入國語辭典（原名國語普通辭典，是大辭典附設的特股，提要見史綱頁三五三；民二十四付印時，改今名），由汪怡先生主編，共四冊，其第一冊剛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盧溝橋事變就發生了；第一二兩案併入國語辭典（原案見史綱頁二八〇），就是我南下西行以來隨時編寫的「十八案」。但不知中海岸旁廟大而充實的總編台，現在究竟怎樣了！

(10)

一般人以為國語運動只是一種「統一」運動，不知這還含有一種「不統一」運動，這就是說全國的山陬海澨所有的方言土語，都要調查，都要利用，錢先生對於此字極感興味，全國地方的音系，他能統籌兼顧，他和趙元任先生一見面，一通信，除民十五前後幾年的音系外，都是討論這一個方音問題（趙先生就在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此事）；他又和顧頡剛先生合作，注吳歌的音，又和周作人先生合作，注越語（是一部舊稿）的音；可惜他身體漸衰，類此的工作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沒有成功。當民十七中海大辭典擴大工作的時候，我對他說：「既總立『糧台』，應分設『兵站』，否則大辭典中每一個字的全國方音和日韓安南等國的讀音，難道就盡由五十年前的蓋爾（Giles）的書嗎？每一個詞的『按史則』的音義，難道

就只憑錢元以來『小說錢西股』的材料，而不徵詢於現代全國各地方流行的土語嗎？（譯官成）『詞查部』也。見史綱二〇四，二〇五。錢先生答道：「匪直此也？你所說的『兵站』，還只限於各地方採辦專運的『糧站』；兵站還有『兵』！他的意思，是要注意民衆教育，制定推行「國音字母」，這是民二十的舊名，民十九教育部改稱「方音注音符號」，以為民衆識字之用。一般人既知道國語運動含有「統一」和「不統一」兩種運動，須知牠更還含有一種「普及」運動，可是教育「普及」和國語「統一」，有許多地方是要發生矛盾的，因為土音太遠於國音的地方，假如民衆非從國音識字不可，那就等於讓他們另學習一種語言；教育「普及」，事倍功半。這是一種矛盾。

「統一」和「普及」兩種運動既發生了矛盾，就可以把「不統一」運動來統一這極矛盾，所以「注音漢字」，每字右旁釘死的注音符號，是拆成標準的國音，左旁臨時偶然添上的注音符號，則為各地自拆自國音偶然不同的方言；這叫做「右對左方」政策。（「右國」是「統一」運動，「左方」是「不統一」運動，「統一」與「不統一」對立，當然更是一種矛盾，那就把中間的漢字和共同的注音符號來統一這「矛盾」，這不是笑話，實際的趨勢確是如此。）錢先生對於「左方」的「國音符號」（這是他折衷而定的名稱），不主張各地方自由隨便亂製亂用，主張中央統制；他在民二十三年的國語委員會第二十九次委員會議通過一個「確定國音符號案」，見史綱頁二八三。「國音符號」的歷史頗長，可就史綱引檢之，方知錢先生之布置此事，有本有源也。這幾年雖在變遷，可是自己這成許多話

音學 (Phonetics) 上的表格，就是元音先生的注音符號總表（即「國音符號」的統籌辦，見卷三三〇），擬的修改，填入系統，隨時與我打電話商量，蓋樂此不疲也。一般人既知道國語運動於「一統」之外，又包含着「普及」運動，須知還有一種「不普及」運動，這就是說一切辦法的決定都要倚仗專家的研究。錢先生近年對於「國音符號」的統籌制定，頗自負，對於就說，非他辦不了；因為古今音韻沿革的研究既是他的專案，又了解全國各地的方言異同（這一點是得力於高本漢的「*Qin-Yin*」的書和趙元任先生的貢獻，因信抄自「系統的音地調查」），春官人就更向高深的專業路上走，淨做「不普及」的工作，而錢先生則一方面專門研究上精益求精，一方面而總求適用於教育，不遺棄「普及」的工作；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喚起民衆；「普及」和「不普及」的矛盾，錢先生可算是真能統一的了。可惜「普及」及「兵械未成」，「兵站」也未會廣布，酒都大邑還不能設法設立（民十七，國語委員會仍照從前的制度，陸續的請「特務委員」約五十人，分設駐省兩縣辦事處，就地籌款，以辦理此項事業爲主要任務；不久由教育司訓令取消。民十九，教育部重頒辦法，由各省市縣教育會各派「指導員」若干人，分赴各縣區，鄉，鎮，鄉，間，指導協助國音注音符號的進行，並調查方言，彙報總局，整理審查，依次彙轉呈請上級教育行政機關及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委員會覆審。法令如此，但完全成了具文），何況窮鄉僻壤呢？（有些人批評錢先生以章門高足，絕頂聰明，不向高處去培植自己「語文學」專家的地位，乃費精神向低處去參加通俗教

育。這種意見，是了解國語運動之偉大的精神，和專家根據。只看究竟錢先生直到蓋棺時，並沒有因其少著書而損及他「語文學」專家的聲譽，並且因其熱心於「普及」運動，曾反比那些專「不普及」工作的專家，感人深些。當民十五年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時，我們發表一篇宣言，宣言國語運動的目標，爲「兩綱四目十件事」，「四目」就是「統一」「不統一」「與「普及」「不普及」，詳見史綱頁二五一。現在錢先生死了，一般人如果要了解他一生的精神，和事業上貢獻，這「兩綱四目十件事」也就可算他的一個概括，雖然他生前只發表「十件事」，並不像我一般喜歡持這「兩綱四目」「玄之鬼」的理論。

二十年的「國語運動」，創於未半，遽隕將星，以後殆成孤撐之局，不能不說是國語中一大損失了。（12）

民國廿八年五月七日，師大在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爲錢先生開追悼會，我有輓詩四首，頭兩首就是約敘錢先生參加「國語運動」的二十年小史，現在附錄如左：（詩句下爲數碼，可以和文中每段下的號碼對照，則全文可當做詩的「法解」看，而兩首詩又可以當做傳文後的「頌贊」看也。）

- (其一)
- 廿載論交久，相助作沮會； (1)
- 雄圖不締武，遠略在吞洋。 (2)
- 勸勒歌聲厲，閩南屢氣張。 (3)
- 鳴金便清野，且共一鏖揚。 (4)
- (其二)
- (5)
- (6)
- (7)

君蒐用體字；
未了昇平局；

我錄注音符；
違言大道初？
(8)
(9)

糧台依海岸；
何遽傳星隕？
(10)
(11)
兵站布山隅。
哀哉勢已孤！
(12)

川康考察旅途報告

鄭象銑

此次征途，因乘汽車，風馳雷逝，不免走馬看花，但景象方面，則頗有變化，爰就觀感所及，簡報如下：

西縣一過，即由漢中盆地入大巴山地。漢水在此，僅存極狹之谷道，水流甚細，公路兩旁，起伏甚大，僅南側有散在之桐樹與麥類，村落則數里不待一見，由此西南，山嶺聳峙，峯巒接天，中以五丁關最高，汽車盤旋而上，凡行七十二「之」字，論距離則僅五公里，而費時達二十六分鐘之久，地形對於交通之影響於斯可見。如此再越兩峯，至朝天驛；是為嘉陵江上游峽谷段，水流湍急，山勢險峻，為秦嶺中所罕見，蓋為一標式之 Antecedent valley 也。若四川境內多東北西南向之背斜構造，而河流則多為西北東南向，故適於地層互交，遂有此種形勢，出峽谷，即至廣元，廣元為川北重鎮，而 Hot Basin 之北界也，亦旅途中第一自然區，吾人若之曰「大巴山地」。

在廣元曾作簡略之調查，述之如下：

- (一) 廣元位於嘉陵江及其支流所合處之 River Basin 中。
- (二) 廣元為 River bank city，沿河均屬碼頭及堆棧區域，亦為該城商業中心。
- (三) 廣元於交通方面處嘉陵江航運之中段，漢寧廣

蓉公路之交點。

(四) 廣元之輸出貿易以藥材為主，除本地及附近出產外，甘肅之兩當，徽成，陝西之略陽等地所產亦均集中於此，本城有大藥號六家，年輸出藥材數十萬斤，此外輸出品以木耳（年產二十萬斤），桐油（年產三十萬斤）及烟煤為大宗。

(五) 廣元之輸入品以紙張，糖，雜貨，鹽，及布疋為主。

(六) 廣元之水運概況：

(1) 航期——終年可航，僅船舶之載重冬夏不同，此與漢河上游及中游之僅能夏秋通航者異。

(2) 數量——洪水期內每日可集帆船 200—300 隻。

(3) 航程——上段至略陽，中段至順慶，下段至重慶。

(4) 廣元至重慶日程——上水一月至二月；下水半月。

(5) 載重——最大載重約 80,000 斤，每年最多往返三次。至於載重 10,000—20,000 之小船則終年可航。

(6) 吃水——大船吃水三尺，普通二尺。

(7) 船戶籍貫——多為由順慶至廣元間之川人。

(8) 嘉陵江在此處之流水型——降雨則水漲，無雨則水退，與本地之雨乾兩季相應，通常高水位期為五月至九月，最晚為六月至十一月。

(9) 運載物品——上行以紙張，鹽糖，黃茶，麥冬為主，下行以荻苳，黨參，棉花，煤，花生，木耳，桐油等為主。

(10) 運費——上水每百斤八元，下水四元。

(11) 行船動力——上行須拖牽，下水須搖櫓，均須二十個人力。

(12) 帆船無帆——在長江中及其南之河流帆船均張帆，利用風力以行船，這裏到沒有，據言因山中風向不定，我想是缺乏「卓越風」。

廣元西南多為 *Sandstone* 相間而成之邱陵地，比高多在 100 至 200 公尺以上，崗巒起伏，山峯挺拔，俱由 *Sandstone* 構成，且山之坡度極大，人車利用，頗稱不易，其中以劍門關為最高，屹立雲表，峯巒奇秀，成一連嶺，蜿蜒若城垣，由礫岩（上部）紅砂岩及頁岩（下部）構

成，中僅一口可穿，堪稱天險，此為旅途中之第二區，亦可稱之曰：「川北高邱陵地」。此區人生活動不發達，梯田坡地，多未墾殖，聚落僅散見於谷底，耕地亦止於是，將來如移民入內，事農耕，則希望固無窮也。現今山地低處，桑桐遍布。居多以育蠶製絲為副業，梓潼，魏城，三台同為川北產絲中心，實基於是，桐油則為第二重要輸出商品。

劍門西南，山勢陡落，是為第三自然區，亦旅途中第三段地形，或名之曰：「川北低邱陵地」，自此以南，地面分割更甚，低邱羅列，溪流棋布，有七曲山，九曲水之名，綿陽即位於此種地形之腹部，盛產稻米，甘蔗，玉米等，而麥冬一項尤為名產。

麥冬為藥材用品，農家之耕作物也，其形如韭菜，最耗肥料與人工，每月須除草兩次，清明節後收穫，旋即播苗，故其生長期為一年，如當收穫時不得價，則可使之再生一年，麥冬在生長期內以五，六，七三月需大量雨水，八，九月長雨，收穫時則須乾燥，每畝產量得 100—200 斤，麥冬地又可加種玉米蘿蔔，共生不碍，現綿陽年產麥冬 20—30 萬斤，依其大小形狀，由婦女擇分而為四種：一、為蘇王，形大而圓較短，銷兩廣及三江（蘇，浙，皖），二為瓜王，形最長大（約一寸），銷兩湖，江西，三為寸冬，乃次於蘇王者，銷陝甘，豫，魯，晉各省，四為瓜冬，乃次於瓜王者，前二者價每担四十至五十元，後二者十元至三十元。考此地麥冬之種植，始於清乾隆年間，綠黨時有縣人王敬由者宦游浙江，其母患心經熱病，曾用麥冬

治愈。歸後母病復發，更使人萬里求之，以其不易得，乃試種於花盆，而花園，而成綿陽農家普通作物矣。

綿陽已有鹽井，年產鹽約600萬斤，農產除稻，甘蔗外，以玉米為最多，當吾人過境時早玉米已上市，生季較漢中盆地當早一月。

至綿陽西南之黃許鎮乃踏人舉目無際之大平原中，是為第四自然區，即所謂成都平原也，水稻遍布，竹林翠翠（均集中於村落四週，無村無之，造成天然圍籬），牛車鵝鴨，散在田間，水稻之外，又多菸草，甘蔗，按成都平原之菸草當為對峙時，即將收穫，割後即插秧，如此一年之中可資三熟，此實由於生季長，灌溉便利及土壤肥沃之賜，四川目為天府之區，實基於此；有本區，即足抗戰到底。成都位於平原中部，市况宏偉富麗堂皇，若若北平，人口五十餘萬，雖在疏散期間，而街衢尤顯來攘往也。成都大氣常陰，每夜常有細雨，雖皓月當空，星輝燦爛之夕，亦必降雨，及天明而止，堪稱絕景。

就聚落方面言，自入川境，典型極異于陝，街道多寬闊，兩旁則多樹木，房屋高大而潔淨，街面均由三合土築成，各城鎮尤以茶館為最多，凡屋宇最高大者，地點最風涼者，及兩街之交接處，無疑義的即為茶館，（成都一市現有茶館五二六家）。茶館之中，規模很大，屋中分上下二層，容納大量人客，終日滿座，其生活之幽閑可以概見。至子一般農民之生活，亦遠較陝西為優裕，此實出于環境之賜，普通白米（不但無砂，其白如阿安南米）每元可購一八——二〇斤，鹽每斤僅售一角五分。

成都嘉定之間，為岷江谷地，兩側悉為低矮丘陵，盛產玉米，地形酷似古路堪，同時亦極開析，故耕地並不僅限于河谷兩側，凡丘陵中之開拆處，均為梯形稻田之分地，又川邱陵，頂部均極平坦，而谷底至頂之坡度則甚大，故山坡不能耕種，但松林密茂，到處青葱，一登山頂，則概為旱作地帶矣，此其特徵也。

嘉定位於岷江大渡河之合流處，而大渡河之支流青衣河又在此相會，故城市之發展，極受地形之限制，而此city之選擇亦基於此。

嘉定四川南水運中心，水至岷江可達成都，灌縣，南達瀘州，更直達瀘州，嘉定之間，夏季五〇〇〇挖船通行無阻，（今由民生公司主辦），西北有大渡河可上航至雅安，沿青衣江可至夾江等地，輸山主為木材，綢緞及紙食糧生產僅可自給，因多邱陵也。農作物以玉米為主，今全縣人口近四十萬，城廓約四萬五千，較漢中為少，至於井鹽，則又為樂山出品中之翹楚，鹽場在城西南二〇里之平寧溪，均為open pits。作成之成邱陵，鑿井取水煎成鹽，井深自一〇〇至二〇〇丈，樂山，現有井二一九七眼，炭灶七九三戶，計煎鹽鍋一二五三口，年產鹽三十五萬担，分雪花鹽與鍋巴鹽兩種，合其原料，二者均同，僅製法有異耳。雪花鹽為自井中汲出鹽水，置鍋煎煮，使水分蒸發，露汁結晶，略加豆漿，即可變白色，一二時可煎鹽兩鍋，每鍋重八十斤，鍋巴鹽則不然，鹽水在鍋中煎煮，繼續加鹽水，使其充分沉澱，愈積愈厚，直至水分完全蒸發後如石塊為止，約每鍋需時四十八小時，重約八〇〇斤。嘉定又有造棉場，日出一萬。此為嘉定之大概情形也。寄自樂山。

廟台子留侯祠

涇 渭

柴關嶺下展開了大好境地，
一幅自然圖畫多麼美麗：
那高大的廟堂在赤松紫柏中隱蔽，
那澄清的小溪在邊旁竊倚！

古碑林立，

木聯櫺比，

曲院幽軒，

無限詩意！

拜石亭雄峙山旁，

授書樓高插天際！

泉聲傳自山隙，

白雲飄在足底！

沒有圮橋上張良的尊老滄履，

那裏有第三洞天赤松子的談道說理？

這美景奇觀，

是俗世人賞？

是洞天福地？

誰配住在這裏？

除了那報韓椎秦翼漢辟穀的留侯，

又誰相宜？

教育與文化消息

薛貽源

(1) 胡庶華氏升任青年團中央團部幹事

胡庶華氏近接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氏來函通知升任為三

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幹事原函云：『春藻兄大鑒：此次中央團部改組，經為呈奉 總裁核准以兄補為幹事，除由團部通知外，專函奉達，至希察照，並頌學安！弟陳立夫頓頌。』

(2) 川康科學考察團在雅安康定途中考察

中英庚款委員會所主辦之川康科學考察團自出發以來已歷兩月該團副團長西北師大地理系主任黃繼璋氏近有兩期於本月六日始與邵逸周先生率領地礦理工兩組團員出發(農林經濟社會三組已先出發數日)本來由樂山一日可到夾江，因團員中多數來自省外，遙望峨嵋(由樂山可以望見三峨全景)極想一覽名勝，故於樂山出發後先到峨嵋縣遊山四日(三天上山一天下山)，弟與邵先生因須於十五日趕到雅安出席預約之團務會議，故於十一日晨先團員而行，經夾江洪雅於十四日下午抵雅安。地礦理工兩組團員，因沿途調查，尚須二三日方能到達，到達後調查一星期，即西去康定。雅安至康定循公路計程二二五公里，現已通車者七四。一公里，惟尚未開始售票；除公路線外，尚有舊道為川康往來大路，由此經榮經漢源瀘定而至康定，計程八日，將來取道何線，尚未決定，兩線經過之區，如公路所經之天全，舊道所經的榮經，皆有煤鐵礦，俱有調查之價值，將來或須分道調查，方不致顧此而失彼。樂山夾江為四川紙業最盛之區，樂山有機器造紙廠一處，專造報紙，以供重慶各大報館之所需……夾江造紙廠用土法，紙分三種，價格雖較昔漲高數倍，然比陝南便宜甚多……云

編輯後記

淵于

(1) 這本刊物一經國內外僑胞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是對時局先生的六月。首對英日東京談判及自衛。傳將在上海作和天津同樣封鎖租界的舉動，有所批評；次則對於最近汪精衛到廣東活動的詭謀，加以嚴正的抨擊；三則確鑿對於但澤問題的積極進攻也有所觀察。張先生是本刊的編輯之一，現任西北聯大教務主任，係國內有數的物理專家，是無須多介紹的。

(2) 胡庶華先生「抗戰前途與青年應有的責任」一文，對於現階段中青年錯誤的觀念，明白地指出，真是金石良言；關於抗戰中青年應盡的責任，條分縷析地嚴厲指示，更是我輩青年所應深切地領會，而加以身體力行的。胡先生是全國知名的學界先進，本刊的編輯，愛護青年無微不至，常著鴻文指示，真是全國青年的導師。

(3) 抗戰前途究竟怎樣，各方人士常有所推測。楊人棟先生前應西北聯大歷史學系之請，作學術講演，以歷史的眼光和例證，來觀察我此次對日戰爭，態度非常客觀，純以學者的口吻明白地加以分析，真是頭頭是道。此篇講稿由張拱貴張家麟兩君加以筆記，并經楊先生改正，不啻是楊先生所親撰的。楊先生現任西北聯大師範學院史地系

教授，能說能文，極受同學歡迎。

(4) 今夏中央庚款管理委員會組織川康科學考察團，專於西南一帶的科學考察，以爲將來開發的根據。該團富有農林，經濟，社會，地質，理工等五組。川康考察隊總隊長一文，就是該團地質組副團長鄧象鏡君由陝南到四川嘉定沿途之所記。鄧君於廿六年畢業於西北聯大地理系，曾在本刊發表「城固風土雜談」一文，當爲讀者所記憶的。

編輯者：精誠半月刊社

印刷者：西北聯合大學印刷部

代售者：正中書局（重慶，成都，昆明）

啓華書局（城固）

大公報分館（西安）

大公報分館（西鄉）

商務印書館（蘭州後街）

復興書局（城固，洋縣）

合衆書報社（城固，洋縣）

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號房

定價：每本一元一角半年一元一角

另售本報